

国旗设计的发展概论

肖聪榕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摘要: 国旗常被认为是一个代表着国家象征与标志的旗帜,意为“象征国家的旗帜”,与国徽共同作为国际交往中的政治与艺术符号使用。国旗的设计、应用、更替在国际社会以及全球各国政治领域中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可以考证,相较于国徽的史料也更为丰富,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国旗设计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国旗的设计,对于国旗这一概念的起源、分类和应用等相关内容都缺乏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没有系统性的概论。文章通过对国旗设计的历史与演变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国旗设计的奥秘和本质,丰富学术界对于国旗设计的认知。

关键词: 国旗;旗帜;国徽;设计

对于中国而言,近现代的“国旗”这一概念与国徽一样同属清朝中后期与欧美文化交流接轨后的舶来品。但是与国徽的设计与使用的不同之处在于,近代历史的中国国旗从设计到实际使用的情况都非常混乱,甚至出现过误用苏联国旗的现象。究其原因,这些现象既涉及到国旗设计的本质,也与国人当时对国旗概念的不理解有关,这也是本文将要分析的内容。

一、国旗设计概述

无论国旗的概念如何变化,但它的本质一直都没有变化——即为辨别身份的“符号旗”,其符号背后所代表的身份、政治、军事等含义皆是人们在实践中根据用途和沟通而探索的使用方式。正因国旗的本质上是旗帜的形式展现一个政权的识别符号,所以有时候能够代表政权的“符号旗”往往不止一面,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相互替代,这也就造成了一些国家或者政权在实际使用中以其他旗帜替代国旗使用。

国旗设计的起源通常与战争和军队的旗帜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早期二者是共用的——因为一个新生政权往往面对着战争的压力,此外军事集团(如革命军、起义军、军政府等)在一个政权中往往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今国际上各国国旗中最古老的丹麦国旗“丹尼布洛(Dannebrog)”便是一面源于1219年丹麦与爱沙尼亚战争中的旗帜;而近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的旗帜史也很具有代表性: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党的旗帜设计经历了无旗帜、军旗设计为实质“国旗”、正式的国旗设计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制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前和抗美援朝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解放军、民兵、志愿军等)无制式军旗,统一以素面无纹红旗或各部功勋旗作为军旗使用;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设计到国旗“五星红旗”设计这段时期为第二阶段。这段时期军旗开始作为实质国旗使用,这一现象在中国国家美术馆馆藏的王少伦油画《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就有表现,此外在1949年中共党委下发的《通知:宣字第十三号》《有关过春节注意几件事的通知》等文件可以作为对于各地解放区悬挂国旗情况的参考——可以悬挂(旧)国旗、党旗、军旗,但不提倡悬挂(旧)国旗,劝止悬挂苏联国旗。

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史来看,“符号旗”的设计与使用作为一种近现代社会制度已经是必然的结果,而“国旗”这一概念是对“符号旗”的升格——既即便没有正式、法定的国旗设计,

只要有“符号旗”的设计便可以充当实质的“国旗”使用。除中国以外,还有古罗马、奥地利、德国、希腊等诸多国家的国旗设计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军旗的用途或受到军旗设计的影响。其中特别是古罗马的“SPQR之鹰”“拉布兰旗”等军队旗帜设计对后世欧洲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很多欧洲国家的国旗或国徽的设计中都是源于这些古罗马的军旗元素与自身的设计结合。

国旗作为国家政权的旗帜标志,其来源与该政权前身的政治实体旗帜标志有关。这些政治实体的符号旗除军旗外还可以追溯到政权前身的商会旗、党旗、殖民地旗等旗帜上,它们在实际使用中会具有很多重性质的叠加,即政治实体的旗帜标志在升格成为正式的国旗前就已经具备一定的代表军队、政权的符号含义了。如沙俄、德意志帝国的国旗最早都是应用于海上贸易的“商旗”,而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国民大革命时期所采用国旗也是来源于反清革命的兴中会旗帜。

二、图腾崇拜对早期国旗设计的影响

具有“符号旗”性质的旗帜在中国自古有之,在周朝就有大量文献记载,如象征军队或诸侯、军阀的军旗和家族旗帜,象征皇室的龙旗等。但这些旗帜的设计和使用目的与代表国家或民族的政权无关,仅为代表个人或某集团的“符号旗”标识。一面“符号旗”是否为实质“国旗”应该以同属一国内的其他地域、集团或阶层是否有权使用该“符号旗”作为身份标识,故而中国在清朝“黄龙旗”设计以前不存在实质上的“国旗”。

因此,国旗的设计起源与国家内部的共同认同旗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共同认同旗帜雏形和国徽一样都可以追溯到“图腾崇拜”上。“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阿尔滚亲部落奥吉布瓦方言“Totem”,弗雷泽学者在论文《图腾崇拜》中是这么认为的:“图腾就是原始人以崇拜的方式来看待某类物质,他们相信自己与此类对象的每一个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而且非常特殊的关系……一个原始人与其图腾之间的关系是互利的:图腾保护着这个人,而此人则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对该图腾的敬意……一个图腾绝非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总是一类对象,一般是某一类动物或植物,比较少见的是某类无生命的自然物体,十分少见的是某类人造物体……”。根据图腾崇拜理论,以群体方式生存的原始人类会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其对图腾的尊敬,这种尊敬方式也可以解释为信仰或者崇拜。这样一个社会就在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群体制度,而他们崇拜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了国旗的前身和国徽,但相较于国徽,21世纪的现代国旗设计虽与图腾崇拜遗留的传统文化有关,但很少国旗有对图腾崇拜的直接继承关系。

对于图腾崇拜和国旗的结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朝的“黄龙旗”。黄龙旗最早原是源自满洲八旗旗帜,而其更早的源头也是中国古代的龙图腾崇拜。“三角黄龙旗”的设计是清朝水师舰船的旗帜而非政府官员用旗帜,是一面典型的军旗设计,而这一旗帜在中国其他对外交流场所中也频繁使用最终促成了近代国旗“黄龙旗”的诞生。直至今日,中国龙纹作为图腾崇拜的产物也仍然保留在不丹的国旗上。

即便是在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国旗也曾经和图腾崇拜有紧密联系,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国旗上,都曾经使用过以及仍然保留着受古罗马文化影响遗留的雄鹰或双头鹰图腾。前者如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现德国、奥地利)、俄罗斯、希腊(东罗马)等欧洲国家的国旗设计上曾使用过源于罗马帝国的“SPQR之鹰”与“双头鹰”图腾元素,但是后来这些图腾元素都被摘下另外作为国徽或军徽设计使用;后者如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以巴尔干地区为主的国家国旗设计上至今仍保留着源于罗马的拜占庭帝国双头鹰图腾元素。

三、国旗设计的发展

(一) 早期的国旗设计

近现代设计的国旗往往以艳丽的色彩和其背后代表的某种特定含义组成旗帜作为识别符号,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国旗设计发展也有着漫长的历程。国旗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其即便是没有来自欧洲的国旗理念影响,人类也会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出类似理念的符号旗用以作为整体的国家政权识别符号。

但是,尽管早期国旗设计多受到了图腾崇拜的影响,但是国旗和国徽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徽归根溯源就是图腾崇拜的产物,而国旗虽然受其影响但并不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因此,早期的国旗设计也是可以脱离图腾崇拜的对象而转用其他理念进行设计,如色彩、文字、图形等标识符号。

中国第一面正式国旗的诞生是在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但是更早以前的1777年海外华人政权“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兰芳公司/兰芳共和国)”中就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国旗设计——以黄地红字上书“兰芳大总制(见图1)”的长方形旗帜,该旗帜的出现时间比日本确定“天皇旗”为实质国旗“日章旗”^①更早,且在设计上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格。可见,国旗是作为人类社会阶段在国际交往中必然出现的产物,其产生与文明所属如欧洲文化或中华文化没有必然关联。



图1 笔者对兰芳大统制共和国国旗复原图

而梳理欧洲早期图腾与国旗设计关系也可以罗马帝国为例,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图腾影响过很多国家的国旗设计,但是其自身的国旗设计是采用了“白底蓝十字”^②(见图2)”,



图2 持白底蓝十字旗接受祝福的希腊起义军,贝纳基博物馆馆藏油画

“四个β”等颜色和符号、字母的设计,而古罗马时期的鹰旗则逐渐脱离了旗帜成为了雕像、硬币图案等实质为国徽用途的设计。

(二) 近现代的国旗设计

到了近现代,受欧洲文化和话语权影响国际上的国旗设计已出现较为统一的设计标准。而国旗设计除本国传统文化外,还有很多外部因素会影响到国旗的设计——如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旗就明显影响了朝鲜、越南、新加坡、不丹等国家的国旗。影响国旗设计的原因和国徽类似,大体都可以归为下列几种——(1)受宗主国/母国文化影响;(2)受相同意识形态/有影响力的外国文化影响;(3)受本国过往政权影响;(4)受国际或欧洲、相同文化圈理解对色彩解读的影响。在国际上受奥斯曼、英国、苏联、美国等强国理念或原宗主国影响了自身国旗设计的国家都跨越了大洲和人种,而一些相邻国家之间的国旗设计也会出现相互影响的现象。比如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学习荷兰三色旗设计后,周边如原南斯拉夫(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斯拉夫民族的国家地区都受到来自俄罗斯国旗的设计理念影响,因而俄罗斯国旗设计的颜色也成为了“泛斯拉夫颜色”寓意的源头。

四、总结

国旗设计究其本质就是以旗帜为载体的符号设计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意义,而其设计理念与军旗、市旗等符号旗的设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为了能够辨别各自身份的符号设计,这也是为什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会出现大量军旗、商旗成为实质国旗的现象。分析国旗设计,对于我们探究该国政治符号形成背后的历史、文化都有重要参考导向作用,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解国旗设计背后蕴含的文化与艺术魅力,同时也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注释:

① 日章旗:日本国旗正式名称为日章旗,但在日本国内常以“日之丸”称呼。公元8世纪时这面旗帜就开始为天皇使用而被称为“天皇旗”,1854年《神奈川条约》签署后“日章旗”成为实质上的日本国旗,但直到1998年日本才通过《国旗国歌法》正式确定“日章旗”为国旗。

② 白底蓝十字旗:“白底蓝十字旗”是一面广泛应用于奥斯曼帝国内希腊族裔的旗帜,也是现代希腊国旗“蓝底白十字”设计的来源,但起源难以追溯只能说很有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实质国旗之一。

参考文献:

- [1] 肖聪榕. 古罗马文化对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影响研究——对源于罗马雄鹰的欧洲国徽设计分析[J]. 今古文创, 2021(02): 35-37.
- [2] 周游. 塑造党国之民: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9(06): 115-123+171-172.
- [3] 冯巧霞, 贺怀锴. 符号与国家象征: 政治视域下的洪荒国旗之争[J]. 天中学刊, 2017, 32(01): 129-133.
- [4] 李军全. “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 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01): 231-237.
- [5] 施爱东. 哀旗不幸, 怒旗不争: 大清龙旗50年[J]. 民族艺术, 2011(01): 6-21.
- [6] 周侃, 汤茂林, 申玉铭. 非洲国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演变机制[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03): 136-145.

作者简介: 肖聪榕(1996—)男, 广东省客家人, 2019级湖南工业大学设计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